

# 亦僧亦俗、自內及外： 東亞大視野下的佛教與教育 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序)

陳金華

爲了重新回溯在東亞大視野之中，佛教教育所扮演的文明傳承的特殊作用，2019年6月3日至5日在中國山西省五臺山召開了由五臺山東方佛教文化研究院主辦，北京大學佛教典籍與藝術研究中心、清華大學倫理與宗教研究院、浙江大學東亞宗教文化研究中心與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拔地入雲”項目 ([www.frogbear.org](http://www.frogbear.org)) (由加拿大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研究委員會 [SSHRC] 所贊助的一項大型國際性、跨學科的有關佛學與東亞宗教的多年研究計劃) 協辦, 山西忻州五臺山大聖竹林寺承辦的名爲“亦僧亦俗、自內及外：東亞大視野下的佛教與教育”的國際佛教學研討會。本論文集就是這次會議的研究成果。本書收錄之 23 篇論文大體分為五大板塊，即“佛教教育與佛教實踐”、“寺學與私學”、“晚清至民國時期佛教與教育”、“近現代中國佛教與教育個案研究：太虛與圓瑛”以及“現當代佛教與教育：從大中華地區到域外”，分別收錄了 5、4、4、4、6 篇來自各國佛教學者的宏文。其分類之原則乃以論文內容為經，時間先後為緯。通篇觀之，庶幾可得古今佛教與教育關係之梗概，以下即以此目錄為據略作介紹。

本論文集第一部份所關注的問題主要是佛教教育對於佛教本身實踐活動所能產生的若干影響，或者是從二者之關係著手而作出的學術考察。其中第一篇論文為黃敏的《從漢譯〈阿含經〉看佛陀的女性教育觀》。此文

通過漢譯阿含文獻來試圖解決佛陀女性觀這一在當代女權主義日興背景之下張力日增的棘手問題。作者認為，通過對這些經典的文獻分析，可以發現佛陀對女性出家的形式和手段有著清晰劃分，還明確區分了出家和在家修行的不同，並因時因地為比丘尼和優婆夷的各自修道方式指明了道路。中國佛教與傳統醫藥之間也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本部份第二篇即為丁嘉燦的《〈素問〉與〈本草〉：道宣對中古醫藥的態度及其意圖》，此文探討道宣(596-667)律師的醫學觀。對於中國傳統醫學中的兩部巨著——《神農本草經》與《黃帝內經·素問》道宣皆有涉獵，但又褒貶分明。他揚《本草》而抑《素問》，其根源還是在於道宣個人的佛教思想。也即在道宣的案例之中，世俗醫學理論並未動搖其宗教信仰，後者反而成為了其評判世俗知識的標準。本部份第三篇論文為馬德的《敦煌本“媚女緣起”中本土元素的社會意義》，此文以敦煌草書寫本《雜緣起抄》中講“媚女”種種行為及後果的片斷為研究對象。這些片斷中以中土貪戀女色而導致嚴重後果的故事來詮釋人生與社會的因果輪迴，這不但體現了這類故事流傳的時代及地域特色，更體現了佛教的中國化與社會化意義。宋代天台宗在經歷了晚唐法難後的典籍缺失與五代十國時的文獻恢復，至趙宋初復歸於興盛。本部份第四篇文章即為討論此一時代中天台宗教法的《宋代天台教院的講授典籍與教學方式》。安詳的這篇論文中探討了宋代天台教院對於後世極其重要的《天台四教儀》的矛盾態度，以及時人在教義講授的繁簡和對儒家外典接受程度之上的爭論。這些教法細節上的考訂，無疑不但對於當時天台宗的教學法研究，也對此宗的整體思想研究皆有很好的啟示。本部份的最後一篇論文為張琴的《法眼宗觀機逗教的特點及其實踐》。法眼宗主要分佈於華南沿海地區，其初祖清涼文益(885-958)以心地法門為根本，融合教禪，構成了極其鮮明的觀機逗教的特點，此後遂得在五代宋初大加闡揚。本文作者即以法眼文益—天台德韶—永明延壽三代教法為研究對象，並論及其對後世佛教教育之深遠影響。

佛教教育的一個重要核心即為寺學這種官學之外的教育體系，它本身就是古代教育中一個容易為人所忽視的重要環節，本論文集之中故收錄了四篇重要的相關研究。其中首篇即為拙作《中古中國以佛寺為中心的知識

孵育與傳播網絡》。佛教教育自印度始，即包括對於世俗學問與技藝的追求與傳播，故佛教教育遠超宗教義理之畛域，而對世俗社會有著重大之影響。故拙文即以中古中國的寺學與私學為樞軸，來顯現此一課題對於研究中古思想與宗教之意義。寺學作為私學之優勢，揆諸要者則有以下數端。即首先寺學所傳播者兼為宗教與世俗之學問；寺院又成為民間三教九流薈萃之地；佛寺優越的藏書資源為寺學提供了堅實的物質保障；寺學之私學具強流動性與與批判性；寺院運營制度成熟完備且具專業化與國際化，故初具現代大學之特質。然安史之亂（755-763）後，佛教日漸保守、封閉，並與農耕文明相結合，這就使其失去了過去的國際性、開放性與淑世之精神。故對佛教寺學與私學關係之探討，即應與當今新的世界大格局相應，以重構佛教在神聖性與世俗性上的再平衡。本節第二篇為何方耀的《晉唐寺院的外語學習和中外文化交流》。此文討論之對象為晉唐期間中土僧俗對於佛經印度原語的教習。作者考訂其主要教學法為譯場中之“譯講同施”。即以早期東來弘法之域外僧俗與隋唐時西行求法僧這些譯經師為師資，而以悉曇類書籍和梵漢字典為教材。至於其特點則有三，即參與者為佛門中人；教學目的為西行求法、佛典傳譯和梵文佛典閱讀；教學內容偏於佛教知識一隅。以上即為何文內容之簡介。唐代是中古文化的巔峰，其輝煌離不開此一時期之開放性與融通性。而佛教作為時代思想的一大組成部分，其勃發與演化的源泉正是在於寺院教育與文化實踐，即所謂“寺學”。本部份第三篇論文為湛如法師的《西方之明：以西明寺寺學傳統為中心》，此文即取西明寺為案例，來考訂唐代寺學之龐大系統，並分析其得以開展的背景因素（僧人的自我宗教追求；寺院的豐富藏書；來自外部社會的制度保障）、教學構成（語言文字學；佛教學；陰陽曆法等雜學）以及文化成果（推動佛教義理研究；涵養寺院文化氛圍；聚攏外語、外交人才）等。本部分最後一篇論文為楊寶玉的《集後進以闡大猷：晚唐敦煌張球寺學考索》，此文以敦煌遺書為研究對象，從中鉤輯出晚唐時期敦煌一位致仕文人張球的寺學教學活動，以此展示中古時期寺學的一個斷面：即一位來自江南的暮年文士為了敦煌地區漢文化的復興，而改編類書或以自己作品來教授生徒。作者以此來證明中古寺學包含有傳道授業和啓迪童蒙兩種類型。

本論文集的第三部份“晚清至民國時期佛教與教育”共收錄有 4 篇文章。其中首篇為張佳的《近代居士與佛教教育》。近代居士在中國佛教現代化的轉型中，對佛教教育問題曾表現出極大的關注，此文即圍繞楊文會(1837-1911)與金陵刻經處、祇洹精舍，歐陽漸(1871-1943)與支那內學院，王一亭(1867-1938)與世界佛教居士林，以及范古農(1881-1951)與上海佛學書局四個典型個案，分別探討其各自的佛教教育理念與模式，進而分析近代居士的佛教教育經驗。第二篇論文為劉懿鳳的《“菩薩公民”宗仰及其現代化佛教教育觀》。近代中國佛教界湧現出一批具有強烈歷史自覺和身份認同的僧侶，他們反思佛教人才的重要性，故大力推動佛教教育事業的開展，其中早期的代表即為宗仰(1865-1921)。作者通過對於宗仰的佛教教育觀與其佛教革新理念的研究，認為他的教育理念與實踐彰顯了融出世精神於入世事業的現代化視野與胸襟。本部份第三篇論文為楊鳳芹的《佛教參與社會教育的方式和途徑——以民國時期佛教在監獄的宗教教誨為例》。在西方，宗教教士入監獄而以教義感化囚犯率為常態，此為中土當代所缺。這篇論文即以民國時期受西方影響而在中國監獄裡興起的宗教教誨的高潮為研究對象。當時的北洋政府及國民政府皆提倡將宗教引進監獄，用以矯正罪犯的犯罪心理，不僅給予了立法支援，更從司法、執法等各個階段推行這一政策，而臺灣地區至今仍繼承並發展了這一傳統。在此文的結尾，作者還探討了佛教監獄教誨在大陸的應用前景。民國時期的智光法師(1889-1963)較不為人所知，但卻也非常重要，尤其是對於此一時期的僧教育而言。本部份最後一篇為邵佳德的《智光法師與近代的佛教僧教育》，此文即以智光為研究切入點，來研究這位早期僧學堂的學僧與後來佛學院的主辦者，智光後來甚至也參與了世俗學校的興辦和教學。邵佳德正是以智光一生所參與的僧教育事業、理念來作為近代佛教發展的一個縮影。

本論文集的第四部分主題為“近現代中國佛教與教育個案研究：太虛與圓瑛”，也同樣收錄了四篇論文。其中第一篇為白冰的《近代世界教育視角下太虛武昌佛學院僧伽教育探究》。太虛的武昌佛學院是其一生之中所參與興辦的三所重要佛學院(另兩所為閩南佛學院與漢藏教理院)之一，此院之興乃是西方現代教育思想日益傳入與國內廟產興學的雙重刺激下所

促成。與傳統佛教師徒授受不同，武昌佛學院這樣的現代僧教育還涉及佛學常識、歷史、研究佛學的基礎知識、哲學等，尤其注重外語的學習。而法務館、圖書館等設立也都使中國傳統的僧教育實現了現代化的初步轉軌。本部分的第二篇論文為楊孝容的《太虛大師與重慶漢藏教理院的抗戰救亡活動》，此文主要依據大量詳實的民國報刊及檔案文獻材料，勾勒了漢藏教理院的成立因由，其在抗戰期間的諸多直接參與抗戰圖存偉大工作的記錄，為我們討論此一時期佛教積極參與社會生活提供了寶貴的片斷。本部分第三篇論文為能仁的《太虛大師的“佛教宗教師”思想——兼論其僧信並建的制度構想與實踐》。此文討論了太虛所提出的“佛教宗教師”概念及其所倡導的出家、在家並重的佛教制度構想和實踐。此文對相關概念設計與組織實踐作了精細的梳理，並且還與當代北美的專業佛教宗教師制度進行了對比，以探討這種制度性設定對於建構未來佛教宗教師系統是否具有參考性。民國時期另一位重要的佛教人物就是圓瑛(1878-1953)法師，而崔紅芬《略論圓瑛大師的佛教教育思想與實踐活動》就是以這位佛學大師為研究對象。面臨與太虛所面對的同樣情境，圓瑛也在江浙、福建等地積極創辦佛學院，使僧人接受教育，提高其文化知識和佛學素養。此文即從民國僧伽教育出現的背景、圓瑛創辦僧教育的實踐和教育主旨等三個方面進行了詳細的論述和分析。

本論文集的第五部份主題為“現當代佛教與教育：從大中華地區到域外”，共收錄有6篇論文。其中首篇為段玉明的《“教”與“教”異：中國當代佛教教育之反思》，此文反思面對近代以來的歷史巨變，以寺院為基地的傳統僧教育體系明顯不適應新形勢，故要求新型僧才培養以僧教育為本、俗教育為枝，由是催生了學院式的佛教教育。作者認為佛教不僅僅是知識和文化，更是信仰和宗教。其超越性不能通過簡單的“教”(知識性獲取)的方式達至，故傳統叢林教育活潑多樣的教學方法，在精英僧才的培養方面仍可以發揮獨特的作用。第二篇論文為聖凱法師的《1956-1966中國佛學院的教育觀念世界：以中國佛教學院和漢藏教理院為背景》，此文具體考訂了1949年後中國佛學院成立後一段特定時期內由於領導層的思想背景所導致的學風特點及其演化。也即1956-1966年的中國佛學院，由

於周叔迦、法尊法師等人的領導，分別承續了中國佛學院與漢藏教理院的師資、教學理念和課程體系。周叔迦更具中國佛教視野，而法尊法師則偏重漢藏佛教的中觀學與瑜伽學。因此，在中國佛學院的課程體系中，周叔迦當年所創辦的中國佛學院的影響力更大，尤其是有關中國佛教的宗派觀念，則完全有賴於他的引入與教學指導。這種情況到了“改革開放”後恢復的中國佛學院的課程體系中就又發生了變化。本部份第三篇文章為何日生的《從宗教教育傳統到現代的轉型：探討佛教僧伽教育的雙重目標》。此文從宏觀的角度來考察佛教教育的現代化轉型，面對現當代社會的種種現實挑戰，何日生主張佛教教育需要注重宗教性與專業性的雙重養成，但又有所偏重，即以宗教性為主，專業性為輔。以人格養成為主，以學術能力為輔，如此方能契理契機，讓傳統佛教在現代社會之中非僅獲得一席之地，而且也能與時俱進。本部份第四篇文章為張梅雅的《從傳統禪宗寺院教育到高等學院教育的思想轉型：以臺灣法鼓山為例》。此文以臺灣的法鼓山為研究對象，來考察臺灣禪宗寺院教育的現代化轉型。法鼓山僧團的創辦人聖嚴法師(1931-2009)自1985年創辦“中華佛學研究所”，直至2014年成立“法鼓文理學院”。作者通過對此一過程的回溯，來考察法鼓山教育系統現代化轉型的內在思想脈絡與特徵。而本論文集最後兩篇論文則分別研究了當代日本與美國的佛教教育。第一篇為山口弘江的《日本的佛教教育與佛教教育學——其歷史與課題》，此文首先回顧了日本佛教教育學的過去，認為佛教教育還沒有被確立為研究領域。另一方面，佛教教育的實踐則在日本蓬勃發展。作者還以駒澤大學為例，介紹了日本大學的佛教教育的現狀，並討論現代日本的佛教教育問題。最後一篇為吳疆的《佛教與美國大學的人文教育改革》。此文首先宏觀介紹了美國人文科學近數十年來的發展歷程，以及佛教在此之中的過去、現狀與未來前景。作者還以哈佛大學、亞利桑那大學等美國高等學府為例，回顧在文科危機之中對佛教在大學課程中的發展所提供的機遇和挑戰。作者認為，與佛教相關的教育課程的開設，將會有力地推動美國大學的人文教育改革，並在人文教育的框架內，發展出一套新的教學和科研體系。

從以上極為粗線條的勾勒中我們大致可以瞭解本論文集較為全面地考

察了古今中外佛教教育相關問題的方方面面。其中既有細節方面教育史實與實踐的微觀考訂，也有宏觀方面思想理論的探索，可以說是對於佛教教育相關領域的一次相當成功的高水平檢閱。佛教教育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不僅牽涉到佛教界的過去與現狀，它同時也關乎佛教與諸多關係方的未來。因此，這就並不僅僅祇是一個理論問題，而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與我們以前諸次會議類似，我們也非常強調並且鼓勵多層次佛教學術梯隊的構建，故而在此次會議之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中青年佛教學者佔據了很大的比例。這種老中青不同年齡層次學者的組合，跨國界、跨領域學者的分工合作，以及學術理論與現實實踐的結合，再加上入世關懷（現實）與出世追求（理想）之間的微妙平衡，這也同我多年來與來自五大洲各國佛教學者苦心經營的“拔地入雲”佛教與東亞宗教研究項目的宗旨有關。我們放眼未來的雲端，但我們同樣腳踏堅實的大地！

最後，我想藉此良機再次感謝本次會議的各組織單位——與我們項目合作多年的五臺山東方佛教文化研究院，以及北京大學佛教典籍與藝術研究中心、清華大學倫理與宗教研究院、浙江大學東亞宗教文化研究中心，尤其是五臺山東方佛教文化研究院院長妙江大和尚以及北京大學佛教典籍與藝術研究中心主任湛如教授的遠見卓識。而如果沒有五臺山大聖竹林寺的諸位法師、義工菩薩的全力後勤保障，則自然也沒有這次會議的順利召開。當然，我們還要感謝各國全體與會學者的高水平表現。佛教學界如眾人拾薪，漢傳佛教的研究在當今世界正處在爬坡上升的艱難階段，此時仍需要各國不同年齡層次學者們的大力支持。而我個人，相信與很多同樣具有類似理想的各國佛教學者一樣，願意成為眾人拾級而上的階梯。